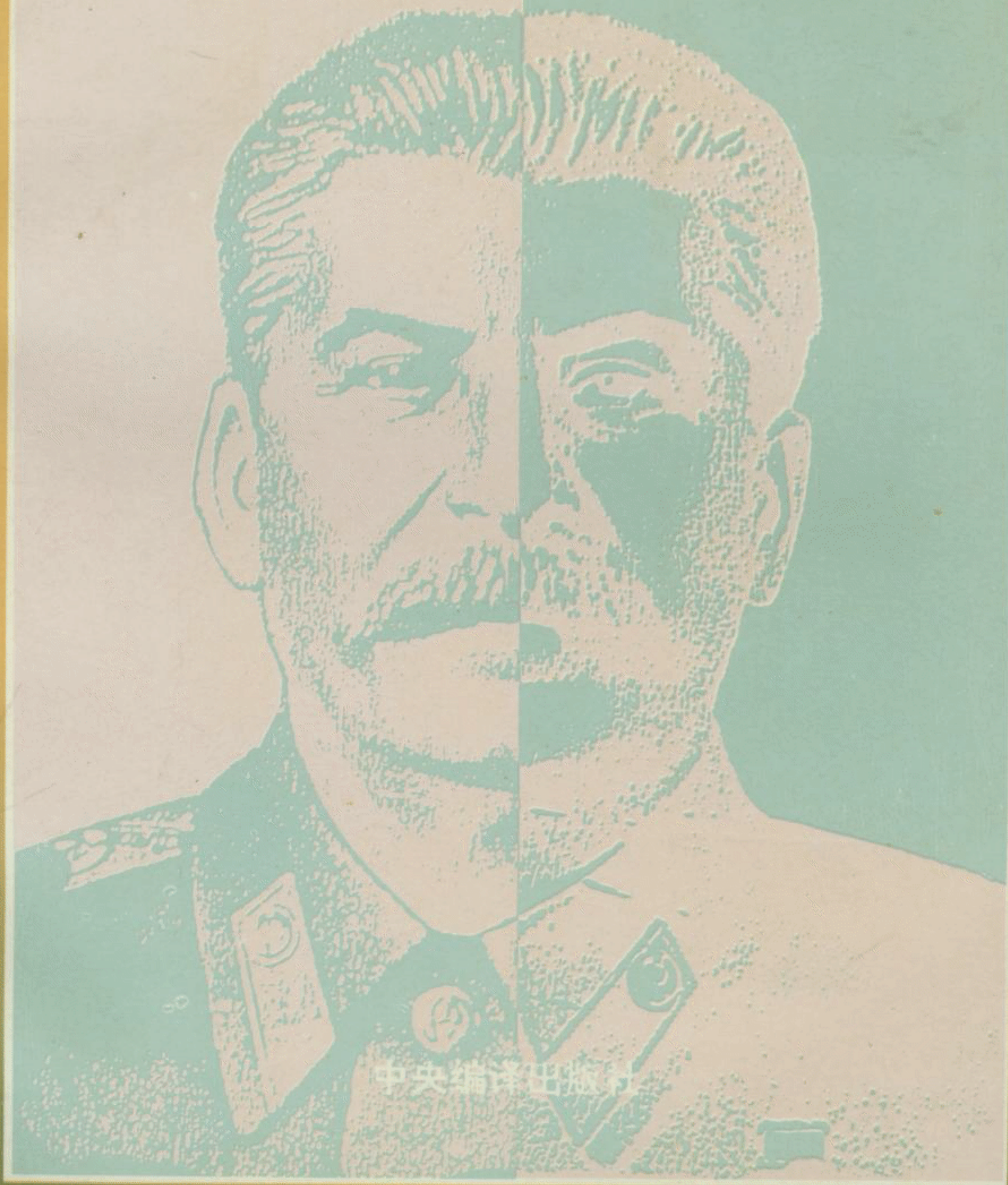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

马尔科维奇 塔克等著 李宗禹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

马尔科维奇、塔克 等著

李宗禹 主编

(下)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北京

(京)新登字 3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李宗禹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9

ISBN 7-80109-018-7

I. 国…

II. 李…

III. 斯大林—思想评论—文集

IV. D8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2753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枣强县天洋胶印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778 千字 印张:31

印数:1—2000 册 共二册总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斯大林主义的起源

瓦·扎·罗戈温*

最近几年，苏联学术界和政论界越来越关注斯大林主义这一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体系得以确立的原因和前提条件。许多出版物披露了反映 20—30 年代历史情况的文件，提出了关于那些年的社会经济政策是否有理论根据的问题，关于一些事件的历史形成过程具有多种选择可能的问题，关于曾经支持过斯大林的冒险主义行为的多数中央委员的集体责任问题。

然而，对于那时的一些矛盾现象至今也没有找到一种有助于揭示形成斯大林主义过程中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的完整观点来加以解释。我们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在对于 20 年代的历史实际的研究方面有一些遗留至今的重大空白。

第一，列宁离开领导岗位后那段时期的党史中有许多极其重要的方面基本上仍未搞清楚。许多政论文章都把 1923—1927 年这段时期描写成似乎是我国生活中唯一光明的时期，其实它却是斯大林及其亲信对党这个列宁在世时曾经是那么完整的生气勃勃的机体进行实际清算的时期，是坚持反对斯大林主义产生和巩固的

* 瓦季姆·扎哈罗维奇·罗戈温，哲学博士，原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编者注。

那部分忠于列宁的老战士被清除出党的时期,这一点并未完全为人们所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上的一切最重大的转折都不再由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做准备,而是由通过上层人物的无原则的组合而构成的政治局的多数人来实行。这一切在客观上为个人专权体制的确立扫清了道路。当这一过程在1928—1929年完结后,党内已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足以阻止斯大林在实行集体化的方法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冒险主义以及他进行的规模逐年扩大、手段逐年残酷的政治镇压了。

第二,最近几年对20年代的党内斗争的解释极为片面,因此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党内生活制度问题被完全忽视了。当时,确立那些年不断出现的每一个反对派都坚持的党内民主原则,在客观上曾是排除斯大林主义的唯一可能的选择,是防止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的社会主义变形现象的唯一可能的保证。

第三,迄今为止不仅广大读者,就连一些社会学学者,都对20年代那些反对派的纲领(除布哈林集团的纲领之外)的内容不甚了解。还有一种情况也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今天,革命后侨居国外的一些活动家的著作正在大量刊印,像别尔嘉耶夫那样的俄国最狂热的反共分子的哲学遗著在筹备出版(这本身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可夫、斯米尔加和拉柯夫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叶夫多基莫夫以及列宁时期的其他许多中央委员的著作却依然一部也未发表,近60年来这些人的主要“罪名”便是参加反斯大林的反对派。因此,那些列宁在世时曾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出过重大贡献,后来又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确立进行了多年不懈斗争的共产党人所代表的经济、社会学和政治方面的党内思想流派仍未得到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列宁不再主持党的工作以后党内生活急剧变形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至少简要地阐明在失去了列宁的

领导的党内出现的第一个反对派所提出的一些思想的内容,并且说明这些思想被否定的原因。

为此,应当对出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一直沿用到现在的某些陈旧观点加以批判。这些陈旧观点中首要的一点就是把后来与党内和国内个人专权体制的确立有关的历史事件转嫁于党的生活中的列宁时期。这种偷换表现在许多目前仍然流行的说法中,如“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实现了政治上的转折”,等等。这种说法实质上歪曲了列宁在世时党的生活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法则:任何政治决定都要经集体讨论和通过。

斯大林篡改历史的另一种惯用手法表现为保持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有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则问题上同列宁的观点不一致,那么这些反对列宁的观点的人即使不是心怀敌意,至少也是在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全、有缺陷。其实,尽管列宁在党内有很高的、前所未有的威望,但从未有人认为只有他才有权发表唯一正确的看法。自由发表意见是当时党内生活的正常的和不可动摇的准则,党的路线也总是通过交换意见、全面讨论有争论的问题来制定的。

正确认识党在列宁在世时怎样对待反对派的问题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当时党内经常不断地进行思想和政治上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与多数人的观点相对立的派别。这些派别随着党对一些问题的解决和其他一些新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消逝,从而争论各方又重新聚合。但是这一切并未妨碍保持党的统一和团结以及党的领导核心的稳定。以下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列宁在世时,那些在十月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党的活动家一个都没有脱离(或被开除出)党的领导层,也没有在党内退居次要地位;从未就哪一个反对派或哪一种“倾向”的出现作出过任何组织结论,尽管分歧有时十分尖锐。再如,1920年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团会议在关于组织国民经济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当时支持列宁的观点总共只有2票,而多数人对投了反对票。同年

秋天莫斯科党组织内部由于以安·谢·布勃诺夫为首的民主集中派的出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出席市代表会议的人分为两派，会议也分别在两处举行，而列宁则充当了调解人^①。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事情的结果是：党既没有分裂，任何一派的代表也没有受到镇压。

就连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工作是依照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过程中提出的纲领进行的）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都不允许对那些处于少数的派别的领导人采取歧视态度。如“工人反对派”的领导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在 479 票中获得 354 票，因而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尽管他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一共才得了 18 票^②。不仅如此，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还强调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反对派提出的意见，把其中的不正确的、不能接受的建议同合理的批评区分开来，这些合理的批评是应当用来实际地解决那些复杂问题的。他在谈到“工人反对派”成员库图佐夫的发言时说：“有些人，譬如库图佐夫，有一部分话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们机关中的丑恶的官僚主义现象。我们回答说：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我们号召非党工人也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应当更好地吸收库图佐夫这样的同志参加这个工作，把他们放到比较负责的岗位上去。这是我们的经验教训。”^③

即使是在国内战争条件下，民主准则也仍然在党内起作用，它们有效地抵制着种种独断专行的倾向，抵制着党的领导向寡头统治或个人专权体制的蜕变。党的最高代表会议——党代表大会每

① 参见《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 1927 年版第 560 页。

② 参见《共产党人》杂志 1988 年第 7 期第 3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1 卷第 47 页。

年召开一次,而在两次代表大会间隔期间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则由中央全会讨论解决。例如在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间隔期间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全会就召开了30次^①。中央委员会不仅向代表大会,而且也向同样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会议报告自己的工作。

从1919年3月起,为解决那些不容拖到下次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而设立的常设机构——中央政治局开始行使职能。同时为了便于对组织工作的领导,还设立了中央组织局。1920年,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保留组织局对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职能的同时成立了中央书记处,让其负责组织和执行方面的日常工作。所有中央书记都是组织局的成员。列宁在世时书记处从属于党的其他两个领导机构。在列宁时期党的领导人在党内没有任何官衔。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会议由列宁主持,列宁不在时则由加米涅夫主持,他们当时都没有任何正式的党内职务。1921年以前政治局成员有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季诺维也夫取代克列斯廷斯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届政治局成员直到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没有变动^②。

以下资料可以说明一些主要领导人在党内的不同声望。在1917年的四月代表会议上有109人参加了投票。列宁获104票,季诺维也夫获101票,斯大林获97票,加米涅夫获95票,米柳亭获82票,诺根获76票,斯维尔德洛夫获71票^③。在几个月之后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是秘密进行的)上,为保密起见没

① 参见《共产党人》杂志1988年第7期第35页。

② 参见《真理报》1988年2月26日;《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9期第77页。

③ 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228页。

有公布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不过,根据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宣布了得票最多的4位中央委员的名字,以“表示代表大会对当选的党的领袖们的拥护”。这4个人当时有的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有的在监狱里,但都被选入代表大会名誉主席团,他们是:列宁——获得134票中的133票,季诺维也夫——得132票,加米涅夫——得131票和托洛茨基——得131票^①。

从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历次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7个人:列宁、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有一次未当选)。在出席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和集团为选举中央委员会而提出的10多份名单中都提到了他们当中的6个人的姓名(除捷尔任斯基之外)。在这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列宁获479票(全票为479票),拉狄克获475票,托姆斯基获472票,加里宁获470票,鲁祖塔克获467票,斯大林获458票,李可夫获458票,莫洛托夫获453票,托洛茨基获452票,布哈林获447票,捷尔任斯基获438票,奥尔忠尼启则获438票,季诺维也夫获423票,伏龙芝获407票,加米涅夫获406票^②。

同时,在国内战争时期党的生活中的民主原则不可能十分完备,当时党在领导国家方面的职能大多是委托党的机关代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把那些年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称为“战斗命令制”和表现为“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

① 这事实直接驳斥了现在流行的这样一种说法:在这次大会上作为区联派成员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托洛茨基曾被布尔什维克当作“异己”。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252页。

② 参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版第402页。

的集体机关的紧缩”的“党组织的军事化”。^① 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把战争时期分散成各个独立的队伍的党重新集合起来。必须使‘上层’和‘下层’、军事工作人员和非军事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者、老党员和新党员、‘年轻人’和‘老年人’接近起来。不解决这一基本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就不能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②

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即在“吸收全体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生活的基础”上达到党的团结和统一，代表大会提出了党内工人民主制的方针。所谓党内工人民主制就是指“在实行党的共产主义政策时所采取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③ 同时，为了纯洁党，大会还重申了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提出的使党员在物质待遇方面趋于平等、对党员滥用自己的地位和物质特权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方针^④。

可见，国内战争一结束，即由于非常状态所造成的对党内民主加以限制的客观因素消失后立刻出现的那些问题，早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被意识到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明确规定了使党非军事化以及确定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作用的任务，这支政治力量是不容许“上层”篡夺属于全党这一完整的生气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分册第51页。

② 同上，第53页。

③ 同上，第53—54页。

④ 参见同上，第55页。

勃勃的机体的权力的。

工人民主制的思想是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的核心，这一思想在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此决议同时还拟定了消除派别活动即肃清已产生的“几个具有特殊政纲、力求在一定程度上闹独立并建立其集团纪律的集团”^①的措施。为了防止派别活动发展下去使党发生分裂，这项决议规定了在中央委员违犯党的纪律或纵容派别活动时由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直至开除出党的程序。在当时未予公布的决议第7条里曾指明可以采取这种极端措施。

由于喀琅施塔得起义而出现的国内危急状况说明了通过这一条是必要的。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坦率地谈了关于决议的第7条与民主集中制相抵触的问题。“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这是对它表示最大的信任，让它来领导。至于说中央委员会对中央委员有这种权利，那是我们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也没有容许过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我希望我们不去用它。”^②

从这些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在党内生活正常发展和国内政局稳定的情况下，上述极端措施本来是应当取消的。但是，早在列宁离位时进行的第一次党内争论时期，斯大林就已把这一条公之于众了，后来又给它加上广义的诠释，并以采取这一条措施来威胁新出现的每一个反对派的领导者。这一条措施被正式采用始于1927年，以后一直被斯大林滥用，到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全会以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97页。

后,开除和逮捕中央委员已经连这种表面程序都用不着了。

斯大林还对“派别活动”这一概念作了广义的解释,在20年代党内斗争过程中,派别活动已成为同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观点存在任何分歧的代名词。派别活动这根大棒成了斯大林争取确立个人专权体制的最主要的思想工具和政治工具。

当时,《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要求消除派别活动,但绝不是要禁止争论,相反,它强调完全有必要对党的缺点进行批评,并由全体党员通过讨论分析党的总路线。为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一些专门文集。“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应当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努力来实际地改正党的错误。……党一方面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和派别性的批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新的办法,大力反对官僚主义,为扩大民主、发挥主动性……而斗争。”^①

此外,在讨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时列宁反对梁赞诺夫所作的修改,因为梁赞诺夫提议在谴责派别活动的同时要禁止按不同的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列宁就此谈道:“我们在这次大会上所得到的教训,是忘不了的。但是,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提议加以否决。”^②

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发扬党内民主的决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极为重要的贡献,它之所以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主要是因为列宁患病。列宁在1921年12月就第一次离职去长期休养了,次年一年间也只不过有几个月的时间(4月份和5月的一段日子,10月—12月上半月)出席党和国家机关的几次会议。其余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01页。

时间他只是通过给中央写信和会见党的某些领导人来过问工作。在这一时期，医生常常不允许列宁同到他这里来的同志谈论政治问题，所以他后来就根本拒绝这类会见了。^①

1922年，在列宁已经不能经常过问领导工作的情况下形成了三巨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联盟，他们集中掌握了党的全部领导权并被半正式地称为“领导核心”。季诺维也夫在回忆列宁患病期间出现的情况时说道：“你们知道，人们曾经对我党中央委员会内形成的核心议论纷纷，也知道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曾默许这个核心将继续领导我们的党，直至伊里奇痊愈，当然这要得到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充分支持。”^②

“默”认“领导核心”的存在说明了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起码在列宁患病期间是被排挤在党的领导层之外的。看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傲慢的、妄自尊大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托洛茨基在党和国家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和声望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首先把托洛茨基看成一个在1917年8月以前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之外的人。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从未提起过他同托洛茨基之间以往的分歧，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列宁不同，正如后来的一些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热中于每时每刻提起这类分歧，为的是贬低托洛茨基的威信和作用。列宁在1922年底曾敏锐地觉察到，中央委员会内和党内“……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③，在这种情况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采取如此态度首先就帮了斯大林的忙，尽管他们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① 参见《真理报》1988年5月13日。

② 《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6年版第454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8—339页。

在三巨头联盟的成员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当时享有的威信和声望比斯大林高得多，职位也比他高得多（按当时的看法）。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季诺维也夫就一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这就是说，他担任了一个在形式上比党内任何职位都要高的职位，因为俄共（布）也和所有其他共产党一样，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季诺维也夫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并兼任党的最大的无产阶级组织——彼得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在列宁没有参加的头两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曾作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且在列宁患病期间代行这两个主要的国家机构的领导职务。他曾在列宁不在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并在列宁逝世后继续履行这一职责，直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止。列宁在患病时期把自己保存的档案资料交给了加米涅夫，列宁研究院就是在这些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加米涅夫是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①。

斯大林是唯一一个从1919年起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的人。1922年4月前他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当时书记处中设有责任书记职位（这一职位最初由斯塔索娃担任，以后是克列斯廷斯基和莫洛托夫）。总书记职位是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确定的。全会选举斯大林担任这一职务。虽然这表明斯大林的地位在形式上有所提高，但总书记职位仍然算是技术性的职位，而书记处也只是政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②。

看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为，在列宁患病期间将由他们对党实行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斯大林则是履行组织职责，而这种

① 参见《论据与事实》1988年第24期；《苏联小百科全书》莫斯科1931年版第3卷第645页。

② 参见《政治教育》杂志1988年第8期第34—35页。

职责在他们眼里是次要的。所以,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一直到1925年也没有意识到斯大林竭力扩大自己的权力将会造成的后果,而列宁在1922年底就已经看清这种后果了。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①,这首先表明,斯大林已经把握了党的干部政策的全部杠杆。他趁列宁不在位之机,开始以在他当上总书记之前不曾有过的规模在干部的选拔、调配和遴选方面实施了由他这个书记制定的种种办法,其目的首先是有独立见解的人从中央和地方的关键性岗位上清除掉。

列宁在其工作的最后几个月里提出的一些原则性建议曾遭到三人帮的抵制。党的这一段充满矛盾冲突的历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不过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中已经清楚地看出,列宁当时要想坚持自己的观点,往往需要付出何等巨大的努力。在列宁患病过程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列宁在与同志们的一次谈话中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后来由于太累而无法继续谈下去了。“这时他感到特别难受,他流泪了,他流泪是因为不能去辩论、去工作,是因为不能去做他认为最主要的那些事情。”^②

列宁同三人帮的分歧在两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第一个分歧是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中央十月(1922年)全会以后产生的,全会通过了关于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决定。列宁在致斯大林并转中央委员的信中坚决反对这个决定并提议在下次全会上重新研究该问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布哈林在收到这封信后重申他们不同意列宁的观点^③。列宁从12月12日至21日,也就是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期间,一连给托洛茨基发去5封信,请他在上述问题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② 《论据与事实》1988年第8期。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注165。

观点”并“在大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列宁当时推测在下次中央全会上“我们有失败的危险……”，便建议“在这个问题上一旦我们失败……就……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①。就因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了其中最后一封信并把它转交给托洛茨基，斯大林竟然对她采取了粗暴无礼的做法。

另一个分歧是由所谓的“格鲁吉亚事件”引起的，围绕这个“事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这一“事件”的起因在于1922年9月15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老布尔什维克马哈拉泽、姆季瓦尼、奥库查瓦、卡夫塔拉泽、钦察泽）拒绝了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9月26日，列宁在得知这一决定以及有关各苏维埃共和国准备联合为统一的国家的其他材料后，发了一封给加米涅夫并转政治局委员的信，信中谈到了对斯大林在上述问题上的态度的担忧。与此同时，已经开始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员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斯大林不顾他与列宁有约在先——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的决议要留待不久的将来列宁重新工作（当时是这样推测的）后由中央委员会讨论，竟提前一星期即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在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讨论。在这次讨论时（9月27日），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相互交换了便条，加米涅夫在便条上写道：“伊里奇打算为维护独立而开战”。（列宁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曾用“闹独立”这个字眼来说明斯大林对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指责的实质）。斯大林对此答道：“依我看，对伊里奇要强硬。”后来斯大林不得不按照列宁的意见修改了决议草案。10月6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完全赞同列宁的建议，所以，用姆季瓦尼的话说，“事情已转到共产主义的理性方面来了”^②。

然而在此之后“格鲁吉亚事件”又进一步发展了。格鲁吉亚中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48—549、550、551页。

② 《真理报》1988年7月8日。

央委员会委员们宣布赞同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定,同时建议审议关于保留外高加索联邦的不合理性以及各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可能性问题。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奥尔忠尼启则指责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上层人物”作出这个决定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破坏党纪的行为,并且称他们是“一堆应当立即抛掉的沙文主义破烂货”。这一切导致了格共中央与受斯大林指使去“狠狠惩罚格共中央”的奥尔忠尼启则之间关系的急剧紧张^①。

当时的情况使列宁感到极为不安,这一点在他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可以看出。列宁在口授完这篇文章后就要求把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全部材料转交给他。尽管斯大林曾加以阻止,但他还是收到了这些材料。列宁看完这些材料后,于1923年3月5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信中请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②。列宁还随信给托洛茨基发去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托洛茨基为自己抄下了“这篇具有原则意义的文章的副本”,并且——用他的话来说——把这篇文章的思想当作“他修改斯大林的(斯大林同志采纳的)提纲以及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的基础”^③。

其他政治局委员只是在1923年4月6日即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才得知列宁的这篇文章。当时政治局以多数

① 《真理报》1988年8月12日。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4页。

③ 看来是指托洛茨基的文章《关于党的一些想法。再论青年的教育和民族问题》(载于《真理报》1923年5月1日)。正文引文见《真理报》1988年8月12日。